

# 抬头是山 路在脚下

李 宇 明

人生无坦途。人生如登山。那“山”，既指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又代表着远大的奋进目标困难的征服，目标的达成，最终要靠双脚一步一步地艰难行进。正如全国政协委员、博士生导师、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教授常说的：“抬头是山，路在脚下。”

每个人都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着一定的社会角色，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有一定的追求和精神。评价一个人，就是看他如何对待这些责任和义务，具有什么样的追求和精神。就我自己来说，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有益于家庭的人，一个有益于学术事业的学者，一个有益于学生的教师，一个有益于教师的学校基层干部。

## 一、做一个有益于家庭的人

我出生在河南省泌阳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乡纯朴的民风、艰苦的生活给我注入了终生受用的中国传统美德，镰刀和斧头塑造了我作为一个现代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共党员的品格与信念。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我考入郑州大学中文系。四年苦读，以优异的成绩应届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但是，正当我接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计划着大展宏图的时候，我的正在读大学的未婚妻却躺倒在病床上，忍受着被人称作“死不了的癌症”的类风湿关节炎的折磨。随着我学业的长进，她的病情却日重一日，后来发展到四肢大大小小的关节都红肿疼痛，生活不能自理。头不能自己梳，脸不能自己洗，衣不能自己穿，甚至连腰带都不能自己系。当时，同学和亲属有许多议论，觉得我和未婚妻的地位有了差距，而且她的身体又是如此之差，两个人肯定要“吹灯”。她怕成为我一生的拖累，竟给我写了一封绝交信。

然而，出乎同学、亲友和我未婚妻的意料之外，1983年元旦，我却带着放大的热恋时的订婚照片，星夜赶到她的身边，拥着她大谈医学奇迹，科学的发展。并似一个专横的将军，武断、草率而又郑重地同她在病床上举行了别致的婚礼。因为我认为，把地位、身体等因素作为爱情的或家庭的成立条件，未免太亵渎了一个人的人格；抛弃身患重病的未婚妻，也是太不尊重自己的诺言和责任的表现。我爱人常说，如果那时我们不结婚的话，我真不知道有没有勇气同疾病做斗争、坚定地活下来。

通过多方求医，加上爱的力量，我爱人的疾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有些医生建议，让我们要一个孩子。说是女同志怀孕生育，有可能对身体状况有所改善。虽然后来证明这一建议并不很适合我爱人，但是我们必然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为人夫，需尽丈夫的义务，为人父，就要尽父亲的职责。当一副沉重的家庭生活的担子压在肩头时，我知道以后的人生路程是十分艰辛的。女儿生下来，我们给她取名叫李纤，纤夫的“纤”。意思是我们家庭的每个成员，都必须像三峡纤夫一样，纤绳深陷进肩头，用血汗和毅力拖着家庭和小船前行，一步不能停，一刻不能松。

有了孩子之后，我爱人的病情日见严重。手指、脚指开始变形，有一两年的时间上下楼都得靠人背，上厕所需要人扶，甚至薄被子盖在身上自己就动弹不得，翻不了身，吃饭用筷子也夹不住东西。有几次我用自行车推她到校医院看病，她竟因身体僵硬而从车子后座上仰面摔了下来。

有一件事情至今我还记得非常清楚。一天夜里，大约一点多钟，我扶她到厕所解大手。我当时住的华师西一村，厨房和厕所都是几家共用的。她在厕所里插不上里面的插销，我只得在外面把厕所的门插上，等她“完成任务”时我再去开门扶她回来。由于需要较长一点的时间，她就让我先回房间里。谁知我竟坐在床边上睡着了。她在厕所里喊了很长时间，我竟没有听见。后来，她的声音嘶哑了，哭了起来，惊动了邻居才把她扶回房间。而我当时还躺在床上没有醒过来。我心中十分难受，向她道歉。而我的妻子却呜咽着说，不怪你，你太累了！当时，她哭得很伤心，我也禁不住热泪盈眶。我感到委屈了妻子。革命先驱李大钊说：“铁肩担道义，双手铸乾坤。”我一个男子汉，竟然连自己的妻子也照顾不好，岂不汗颜。

人病得时间长了，心情也就往往不好，而且也比较敏感，特别注意周围的人对她的态度。我从外面回来，就把所有的烦恼和疲劳都留在门外，总是微笑着给她洗脸梳头穿衣脱鞋洗澡剪指甲，耐心地操持家务照料孩子，绘声绘色地讲学校里的趣闻，要她分享外面精彩世界的快乐。看她烦闷时，我就来几句能令她欢笑的幽默，甚至还常维妙维肖地模仿影星们的滑稽表演，这样做一开始还挺见效，时间长了，她反而觉得给我增加了负担，耽误了我的事业，思想更沉重。思想一沉重，身体就更加不好，有时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后来，我终于找到了从根本上激励她的办法，那就是使她感觉到活着有价值、有意义。我们一起讨论儿童的语言发展问题，一起讨论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我的文章写出来，她是第一读者。最能让她精神起来、忘却痛苦和烦恼的，就是这“家庭学术活动”。

这些学术活动不仅鼓舞她扬起生命的船帆，而且还真使她在学术上入了门。她的心情开朗了，身体在不断的治疗中得到好转，并且真正成了我科研上最得力的合作伙伴。1990年，我们还合著了《父母语言艺术》一书，由北京语言学院出版，把我们的思考和经验教训，贡献给社会，贡献给天下的父母们。

我在与同事们一起撰写的《汉族儿童问句系统习得探微》一书的前言中，曾满怀深情地记下了她为我和我们的研究课题所做的贡献：白丰兰女士身患类风湿关节炎，久卧病榻，但仍然坚持用已经变形、近乎残废的手颤颤抖抖地帮助记录了几百万言的孩子发展日记，帮助整理资料和分析研究……我们愿把为人妻的她们（还有我一位同事的夫人）对丈夫的理解和爱，对儿童语言研究的崇高的奉献精神铭志于此，以示敬意；并希望人们不要忘记男人后面默默劳作的女人们！

## 二、做一个有益于学术事业的学者

当我在38岁破格晋升正教授时，我的同事们曾开玩笑地说，“教授”应有我女儿的一半。因为我是从事语言学的科研和教学工作的，研究的主要兴趣点是儿童语言的发展，在众多的观察研究对象中，我女儿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此而言，说“教授”有女儿的一半，这话并不完全是玩笑。然而，我走上儿童语言的研究道路，并在此领域里做出一些成绩，却是我始料不及的。

1984年底，我获得硕士学位，留校执教。寒假，我带着亦喜亦忧的心情回到当时我爱人的工作单位河南省信阳地区教师进修学院，去迎接我的女儿的出生。此间我一直在思索着一个问题：要事业还是要家庭？因为我明白，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需要将全部的身心投入进去，“十年磨一剑”。而我为人夫，需要照顾卧病的妻子；为人父，需要尽做父亲的天职。没有三头六臂，怎堪负起如此重任？然而放弃事业，我心不甘；放弃家庭，良心更不忍！刚刚获得硕士学位的我，深深困陷于家庭和事业的矛盾漩涡中。

正在我进退维谷、山穷水复之时，不知接通了哪条神经通路：应该搞儿童语言研究。是的，从学术上看，儿童语言的研究是当代发展心理学、认知科学、教育学、语言学共同关心的对象，是当代理论语言学的三大支柱学科之一。在西方，这方面的研究有长足的进展，而我国虽然从“五四”以来心理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开始注意这一领域，但并未取得系统的成就，而我国语言学界尚无人涉足，是一块学术上的风水宝地。从家庭看，照料妻子女儿倒变成了一个十

分有利的条件，我可以与我的观察对象形影不离，我的妻子虽然重病缠身，但仍可以帮助我进行观察，会成为我科学研究的助手。于是，我就下决心投身于儿童语言研究，期望家庭和事业双兼顾。

就某种意义而言，做出一个选择并不太难，难的是矢志不渝地朝着选定的道路走下去。我国的儿童语言研究起步较晚，在这块儿近荒芜的学术领域里，可资借鉴的成果相当有限；关于儿童语言发展的研究素材搜集起来需要较大的精力、较长的时日和较多的经费；儿童语言研究涉及到理论语言学、发展心理学、教育学、遗传学等相当宽阔的学术领域，仅靠我科班学习的现代汉语知识远远不够。

科学研究首先需要有深入细致的第一手观察材料。我不仅兼任护号、爸爸和“家庭妇男”数职，还给爱人大侃儿童语言学，并买来几十本儿童心理发展和儿童教育的著作，找来一大堆纸片和铅笔头，鼓动她帮助记录女儿的语言发展，共同创造一个新的学术天地。

记录女儿语言发展的计划，自女儿出生第一天起便在医院的产房里开始实施，一直坚持到她开始上小学，2250余天，记下语言发展日记几百万言。据我所知，世界上个案日记跟踪最长的为0~3岁多。这些日记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扎实而又可靠的基础。不过坚持把这些日记记录下来，并保存下来一些录音材料，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以至于现在让我们重新做一次，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勇气和毅力。

1985年，我和爱人的工资加起来才百来元钱，就这点钱除了四口人的生活费（当时我爱人的侄女来帮我们料理些家务），还得定期给双方的老人、给正在读书的弟弟妹妹寄点钱。因此没有钱买录音机和磁带，只能用我读研究生时吡啦作响的旧录音机和用过数次的旧磁带。当时我爱人还没有调入武汉，她和侄女一边观察记录女儿的语言发展，一边录下音寄到武汉或托人顺便捎来。而我必须在两三天内把录音用国际音际等符号，转写成可视性的材料，然后再把磁带立即寄回信阳重录，否则就“青黄不接”了。正是这些录音材料使我在后来能够写成《1~120天婴儿发音研究》，发表在《心理科学》杂志上，并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反响。

1985年底，在校系领导的关心下，我爱人调入华中师大，并在华师西一村有了一间房子。这不仅使牛郎织女得以团聚，而且也给我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当时14平米的斗室里，到处都放着纸片和铅笔头，全家人的衣兜里也都装有纸片和铅笔头。女儿真成了“小皇帝”，全家人围着她转，几双眼睛盯着她那张稚嫩而红润的小嘴，只要女儿尊口一开，就像下了“圣旨”，我们马上奔向随处放置的纸和笔。当我因上课等而不在家时，妻子便摸到放在床头的笔和纸，歪歪扭扭地记下孩子的每一句话。轻便的铅笔对妻子来说，竟像大棒般沉重，写出的字浑如小儿涂鸦，过后有时连她自己都几乎不认得了。最气人的莫过于笔常常掉在地上捡不起来，写几个字胳膊就抬不起来，脖颈僵硬如石膏像。这时，她只得把听到的女儿的话，一遍遍在心里默诵，生怕记错了一个字。等我回来再记在日记上。学术出差，到庐山、长沙、桂林，我也把女儿带在身边，生怕漏掉她那宝贵的只言片语。在学术界传为美谈。

夜深人静，一扇扇窗户都黑下来，而常常是我家的灯光还亮着。为了不影响家人休息，我用仅有的几件家具在墙角里围了一个白天光线照不进、夜晚光线射不出的个人天地，只能放一张小桌和一把椅子。正是在这个三尺见方的小天地里，正是在夜里十一点以后才能进入工作状态的小天地里，我伏案整理一天的收获。并写出了《乳儿话语理解的个案研究》、《儿童第二信号系统建立的判定标准》和《独词句阶段的语言特点》等论文初稿。这些论文后来修改发表在《中国语言学报》、《语言研究》等刊物上，或在中国语言学会年会等学术会议上宣读。不少语言学家认为，我的研究是为儿童语言在中国的发展做了奠基性的工作。这些成果也引起了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香港等海外、国外学术界的关注。

几年来承担了国家中华社科基金、国家教委的科研基金等三个有关儿童语言研究的科研项目，发表论文论著500余万言，我所主持的科研项目成果《汉族儿童问句系统习得探微》，获湖北省首届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国家高校首届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新近又出版了30万字的专著《儿童语言的发展》。

此外，我把这些研究成果运用到聋哑儿童语言的康复中，主编的《聋儿语言康复教程》获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宣部等单位1994年举办的全国首届“奋发文明进步图书奖”二等奖。参

编的《文化语言学》1994年获华中师范大学科研一等奖，并受到日本学者的重视。1994年经湖北省政府批准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并享受国家的政府特殊津贴。

科学研究需要资金和设备，但是更需要精神。需要为科学献身的精神，需要作为一个中国人不甘落后的民族自尊精神。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籍。一个真正的好学者，就是要使自己的研究达到世界水平，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好学者。

### 三、做一个有益于学生的教师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教育不能救国；但是，在当今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教育却可以兴国。每当看到“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标语，我都会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不仅感到当一名人民教师的光荣，更感到教师肩头的担子的沉重。

在教学上，我承担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四个层次的教学任务。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课程内容在一段时期内落后于学术的发展，也与当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有一定的距离。我从踏上神圣的三尺讲台起，就立志要力所能及地在自己的教学中逐渐改变这一状况。和我的老师、同事们编写了10余部充满新的学术气息的教材，开设了近10门新的语言学课程，其中有一些是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设的。在教学中，我提出了“科学轴心”的教学理论，希望把学生迅速带到当今科学的前沿地带。

只有高深的知识并不就算是人才，人才还需要有现代化的意识和我们社会所认可的高尚品格。教师不仅在知识领域里要把学生迅速地带到科学的前沿，而且还要注意用我们社会的思想品格来培养教育学生。教书和育人同样重要。而育人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教师自己的垂范。我在担任学生班主任时，曾雪夜给学生送去棉被，而自己却裹着大衣过夜；还曾数次拿钱作学生活动的班费，或是资助家境贫寒的学生。

特别使我难忘的是1991年秋季。为了让学生了解社会，中文系组织学生到黄冈老区进行社会调查，并希望我能做一个小组的带队老师。当时，我的女儿刚好到上小学的年龄，从住的地方到华师附小还有一段路，而且路窄车多，很不安全。妻子的身体状况又不允许她去接送孩子。在公私不能兼顾的时候，我安排好家务，仍然到黄冈的团风镇上寨村，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调查，一去20余天。上寨的村民很感动，授予我“荣誉村民”的光荣证书。而我在社会调查中也接受了教育，提高了认识，净化了灵魂。

我曾连续三次获得华中师范大学教学奖，1992年获国家教委主持的霍英东教育基金奖，1994年教师节获得湖北省优秀教师称号。湖北省董必武教育基金会赠送给我一块手表，手表的嘀嗒声，不断提醒着我作为一个培养教师的师范大学教师的责任感，激励着我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 四、做一个有益于教师的学校基层干部

一九九四年九月，华中师范大学成立文学院，组织上命我出任文学院副院长，分管科研、研究生和师资队伍建设的的工作。一九九五年底，又开始担任文学院院长。家庭、科研、教学和行政工作四副担子压在了我肩上，各种矛盾更突出了。

民主主义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提出“天下为公”的主张，这一主张在我党的实践中得到真正的落实。伟大的毛泽东同志倡导“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优良作风，富有远见的邓小平同志身体力行地进行改革开放。我深切地体会到，只有把“公”字顶在头上，把“实”字握在手里，把改革开放装在胸中，才能把行政工作做好。

“公”就是奉献。在一年多的行政工作中，我学会了在白天处理文学院的事务和教学工作，到了夜里再回到学术研究的语言学殿堂里；学会了利用周末到菜场多采购些食品，并集中地做些家务。今年9月初，正是新学期开始，是学校最忙的时候。我60多岁的母亲摔断了四根肋骨，

但我却不能及时赶回河南老家，只好让我的小妹妹从武汉回去照顾母亲。我心里非常难过，人真有“忠”孝不能两全之时。

“实”，就是以从事科学研究的态度和方法，做好自己分管的工作。现在，高校的教育经费空前紧张，教师的生活相当清贫。但是多数教师所追求的不是物质的高消费，而是有一个较好的学术环境和活跃的思维空间。依据这种分析，在科研管理方面，采取了一些旨在激发和保护教师的科研积极性的措施：以人为单位张榜公布教师一年来的科研成果，使人们对全院每个教师的科研状况有所了解；设立本科生、研究生和教师的科研论文奖，奖励在本专业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优秀论文。以树立一个良好的科研导向，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气氛。

当前，正处在世纪更替、千年之交的历史关头。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改革尤其重要和困难。因为教育不仅牵涉到科学知识体系，而且也关乎社会价值体系。从知识体系上看，我国的教育必须尽快地同国际教育对接，但是，从价值体系上看我们又不能盲目地同国际接轨，抛弃我们的价值体系。从国内的形势看，一方面国家需要培养一批根底扎实且具有现代化意识的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才，另一方面社会又急需知识面宽广、适应性强的应用性人才。

在研究生管理工作中，根据学科的发展、社会的需要和研究生培养中的一些经验与教训，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正在进行“人才分流培养”的尝试，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如严格规定了研究生导师资格，在二级学科的基础上开设专业通选课，把专业外语的教学同专业学习有机结合，加强“专业中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同时试行研究生同高年级本科生课程的交叉互选，等等。这些改革，较好地调动了研究生和导师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发挥了我院科研的群体优势，并对本科教学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其中有些作法，受到国务院学位办公室的好评。

一九九五年九、十月份，我作为全省知识分子的代表，参加了省纪委、省直机关工委、省委宣传部组织的“湖北省勤政廉政先进典型事迹报告团”，在全省各地作巡回报告。今年“五一”前夕，我又被命名为湖北省劳动模范。

当然，我心里明白，我的眼前仍横着座座高山。我的妻子现在生活上还处于半自理状态，我的女儿还在上小学。在科研上，我还要努力地超越自己，文学院的行政工作更增加了我的负荷和责任。这使我蓦然记起宋代大文豪杨万里那颇具哲理性的诗句：“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过松源晨炊漆公店》）是的，路正远，道更艰。但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总是要作些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有益的事情。我仍须用纤夫的精神，眼睛紧盯着山顶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一步也不停，一刻也不放松！

抬头是山，路在脚下！

一九九六年六月六日